

张居正与老师和学生的故事诠释 何为良师？何为高徒？

在中国文化中，师生关系很特殊。读《明史》时，读到张居正与老师和学生的故事：他的一生恩师顾璘，他的得意门生于慎行，两个故事，均非寻常，不由思考一个话题：
何为良师？何为高徒？



顾璘

先说顾璘的故事。

顾璘是江苏吴县人，从小就是著名的才子，也是个有性格的才子，21岁中了进士，开始进入仕途，当河南开封知府（从四品）时，得罪了大太监刘瑾的亲信、镇守河南的权阉廖堂，给打人锦衣卫狱。看过电影《绣春刀》的都知道，锦衣卫狱是个很可怕的地方，但顾璘确实清白，出狱后，贬为从五品的广西全州知州。但牛人总是不怕挫折，顾璘最后做到了正二品的南京刑部尚书。一个历经世态炎凉、人生经验丰富的沧桑男子。

明嘉靖十六年（1537年），顾璘任从二品的湖广（包括今天的湖北、湖南和河南小部分）巡抚，遇到了一个比他更牛的才子。

这个才子时年13岁，从小就有“神童”美誉，他在前一年通过童试，考取了秀才，这次来参加乡试考举人。以他的才华，“中举”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在明清两代，“中举”可了不得，意味着有了做官的“正途出身”。吴敬梓的小说《儒林外史》里有个“范进中举”的故事，起初人人都瞧不起范进，但他一旦中举，亲戚邻里包括他那个势利的岳父，都去奉承他。

顾璘见到这位神童，欣喜若狂，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：不让他中举。

这个神童，就是张居正，日后他成为有明一代最牛的人之一。张居正，1525年生于江陵县（今属湖北荆州），时人又称之为“张江陵”。朱东润在《张居正大传》中写道：“这时居正的声名，在湖广已经很大，所以主考给他临时的口试，和平常的形式不同。单凭居正的年龄和声名，原有中举的希望。

但是，因为湖广巡抚顾璘的主张，这次却没有成功。”顾璘是怎么考虑的？《张居正大传》中说：

“他认为13岁的孩子就中举人，以后便会自满，反而把上进的志愿打消，这是对张居正的不利，因此主张趁此给他一些挫折，使他更能奋发。他和监试的冯御史说：‘张居正是一个大才，早些发达，原没有什么不可，不过最好还让他迟几年，等到才具老练了，将来的发展更没有限量。这是御史的事，一切请你斟酌罢。’这次居正的考卷，很得湖广按察金事陈束的欣赏。陈束极力主张录取，但是监试御史想起顾璘的吩咐，竭力拒绝，居正竟没有录取……”神童张居正的少年中举之路，就这么给切断了。3年之后，他16岁，再次参加乡试，顺利中举了。恰好此时顾璘正在安陆督工，张居正到安陆去拜见他，顾璘很高兴，有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，把自己腰间围着的犀带脱下来，赠给张居正。中国古代官员穿的衣服、束的腰带，根据官阶品位，有着严格限定。在明代，一品玉，二品犀，对于16岁的张居正来说，这是珍贵的赠品，更珍贵的是顾璘的赠言：

“上次你本来就可以中举，因为我的原因，耽误了你3年，这是我的错，但是，我希望你要有远大的抱负，要做伊尹，要做颜渊，不要只做一个年少成名的秀才。”

伊尹是商朝初年著名政治家，曾辅助商汤灭夏朝；颜渊即颜回，是孔子最得意的门生，终生未做官，但后人对其品德推崇有加，被后世尊为“复圣”。顾璘对张居正的期望，是他成为一个“伊尹+颜回”式的伟人，既能建功立业，又有高深学问和高尚品德。

顾璘留张居正吃饭，还把自己的儿子叫出来，告诉儿子：这个是荆州张秀才，“他年当枢要，汝可往见之，必念其为故人也。”

他的预言很准确。但这位经历过官场大风大浪的高级官员欢喜之余，仍然有些隐忧：张居正16岁中举，还是太早了点儿……

刘台。张居正倒不是心胸狭隘之人，这事忍了。

但首辅大人忍无可忍的事来了：他的父亲去世，按明朝规矩，官员此时必须尊制守丧，所谓“丁忧”。但张居正正在权力巅峰，怎舍得辞职放下一切，回江陵老家待上两年多时间？但如果不辞职回乡，又有违孝道，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。怎么办？张居正熟悉律例，就指使门生提出“夺情”，即因特殊原因，国家强招本应“丁忧”的人为官。皇帝批准了这份“夺情”的申请。结果举朝哗然，不少大臣纷纷上书，要求皇帝收回成命，酿成了著名的“夺情事件”。

张居正很恼火，以粗暴手段来对待反对的官员。但他发现：自己的得意门生于慎行，哪里会细琢磨学生的心理话？暴怒之中，拂袖而去。

张居正死后，赠上柱国，谥文忠，在过世前10天，还被加封为“太师”，为有明一代唯一一位在生前受封此职之人。但风云突变，张居正迅速被污名化，张家被抄家，张氏一族从天堂跌落地狱，时人避之不及。但此时，于慎行又挺身而出，冒着触发皇帝雷霆之怒的风险，为张居正鸣不平。他写信给素与张居正有私怨、此次奉命如狼似虎般前往江陵查办此案的侍郎丘樞，“居正母老，诸子覆巢之下，颠沛可伤……”请丘樞念及张居正80多岁的母亲和尚未成年的幼子，不要过于苛厉，给他们留下活命的机会。

在于慎行带头的努力下，皇帝让步了。张居正没有沦落到死后被鞭尸的惨境，他的家人也没有被赶尽杀绝。

三

在今天，再读顾璘与张居正、于慎行与张居正的故事，深切感受到：为他人着想，不仅需要善良，更需要智慧和勇气。

中国古代强调“天地君亲师”，师生之情，是古人在血缘与婚姻之外最为看重的亲密关系。尤其在古代官场，师或生，皆是极其重要的人脉资源。我们能在史书中，读到师生互相利用甚至狼狽为奸，读到师生恩断义绝甚至反目成仇，但也能够读到师生肝胆相照、同舟共济，还能读到像顾璘对于张居正这般苦心孤诣，读到于慎行对于张居正这般真心实意。

何谓“苦心孤诣”？顾璘不是去打造一个神童的神话，不是去炮制一个“13岁中举”的传奇，而是以高度的责任感，来为大明培养一个真正的人才。所谓“少年不能顺，中年不能闲”，顾璘是一个人生经验极其丰富的过来人，太了解“伤仲永”的悲剧故事，在开国气象不再、时局岌岌可危的当下急需用人。他不愿意看到一个天资过人的栋梁之材，因少年得志而浮躁傲娇，因得意忘形而放弃磨砺，最后沦落为唐伯虎那样的风流之辈，空有一身才华，却最终在勾栏瓦肆、醇酒妇人中消磨一生。

顾璘初遇张居正，正是后者冉冉上升、光环耀眼之际，顾璘毅然决定让他晚3年再中举，打磨一下他的锋芒，销蚀一下他的自得，阻挠一下他的顺境。对少年张居正而言，这是弥足珍贵的一课：毕竟，人生多坎坷。一个人，实质不可能永远一帆风顺，何况在大明朝云谲波诡、凶险重重的官场。如果对人生顺境充满不现实的期待，缺乏千锤百炼、咬牙坚持的心理预期，那会死得很惨。顾璘此举，还告诉张居正：一个人，不是光有才华就行的，要坚强自律，自省不足，方能披荆斩棘，坚强前行。

从常人的理解，顾璘此举，很可能是吃力不讨好，并不一定为当事人理解，甚至误解：谆谆教导不就行了么，何必取消人家中举资格呢？但这恰恰是顾璘的苦心孤诣，一个杰出的人生规划师。好在张居正毕竟是张居正，他得知实情后，感动不已。许多年后，他身居高位，更能理解顾璘的苦心：“自以童幼，岂敢妄意今日，让心感公之知，恩以死报，中心藏之，未尝敢忘。”



张居正 (1525-1582)

何谓“真心实意”？于慎行坚持在任何场合都讲真话。讲真话，特别不容易，甚至会给自己带来灾难。张居正权倾天下时，因为“夺情”一事，于慎行讲了真话，无疑让张居正大为恼怒，以师生之谊逼问于慎行。但于慎行的逻辑是：正因为你是我的恩师，正因为你平素厚待我，所以，我必须提醒你。此刻舆情汹汹，你若看不清形势，一意孤行，会让自己失去民心。遗憾的是，此时的张居正，已经被权力麻醉，不再是站在顾璘面前、听罢一番话后热泪盈眶的16岁少年了。

张居正死后惨遭清算，完全出于皇帝旨意，谁都能看清楚风向，下面执行者，手段愈残酷，愈能显示自己忠君。比如荆州江陵地方官，早几年在张居正回乡时，长跪迎接，恨不能变成孙子。如今听说皇上要抄张居正的家，京城抄家的人还没来，他们就先动手了，把张居老幼妇孺关进黑屋，断粮断水，任其自生自灭。等京城的人赶到，打开黑屋，惨不忍睹：已经活活饿死17口，其中有3名婴儿。京城办案人员更残酷，张居正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逼供，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后自杀：“丘侍郎、任巡按，活阎王！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……何忍陷人如此酷烈！”

丘侍郎就是丘樞。张居正当权时，他不被重用，如今正好找到泄愤机会。相比之下，于慎行的人品，不知比他高了多少。在“夺情”事件中，于慎行因为说真话，也受到张居正打压。但在墙倒众人推、不推不正确的時候，于慎行没有附和，也没有沉默，而是大声疾呼，为张居正鸣不平，为张氏族人求宽恕。因为张居正是他的老师，更因为他坚持自己的逻辑：张居正于大明有大功，虽不符他生前众人吹捧之盛誉，但也没有他死后你们骂得这么差。这个意思，他在给丘樞的《与邱侍郎书》中写得非常明确：

“当其柄政，举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，今日既败，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，皆非情实也。”

“皆非情实也！”五个字，真是一针见血！

老师对学生，最看重的是“成长”；学生对老师，最看重的是“回报”。顾璘作为老师帮助张居正成长，于慎行作为学生对张居正的回报，不同寻常，令人感佩。可贵之处，是无私。他们只为张居正着想，没有丝毫个人利益。

这就是良师，这就是高徒，张居正是幸运的。

四

张居正也是不幸的：他有一个更重要的学生，明神宗朱翊钧。这对师生，堪称失败的老师、失败的学生。

朱翊钧登基时只有10岁，生母李太后属于“虎妈”一类，对他的学习抓得很紧，老师，当然要选最好的，非张居正莫属了。朱翊钧对张居正也非常信任，“而大柄悉以委居正”，对老师也尊礼有加，言必称“元辅张先生”，或“张先生”，从不直呼其名。无论是君臣，还是师生，均是难得的佳话。但为何张居正死后，朱翊钧却差点儿把张先生给开棺鞭尸了呢？

说来说去，还是师生之谊在封建皇权之下的变异。作家熊召政在长篇小说《张居正》中曾写过这么一段：

“朱翊钧长吁一口气，叹道：‘张先生铁面宰相，何等了得，然也——难逃一死。’”

“张鲸听出皇上的话中含有几分幸灾乐祸。他揣摩皇上对张居正的感情非常微妙：既敬重又憎恨，既依赖又忌惮。敬重的是张居正作为顾命大臣，10年来把个混乱腐败的朝政治理得井井有条；憎恨的是张居正对他要求太严，特别是万历六年的那道《罪己诏》，让他脸面丢尽；依赖的是张居正作为他的师相，10年来不仅事无巨细一一施教于他，而且替他排除所有的艰难险阻，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移山心力；忌惮的是张居正独揽朝纲功高盖主，如今天下官员，都议论他这位太平天子之所以能够端居庙堂四海咸服，就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……尽管张居正严守臣道，对他礼敬有加，但他在张居正面前，总是小心翼翼，像一个生怕做错事情的小媳妇。处理朝政，他对张居正言听计从，但每签发一道圣旨，他又怅然若失——皆因张居正的票拟，他不敢擅改一字……如今，这位宵衣旰食不苟言笑的宰辅，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，皇上在悲痛之余，有几分幸灾乐祸也是情理中事……”

张居正死了，朱翊钧解脱了，再没人管教他了。他从一个勤奋的学生，变成了一个懒惰的皇帝，20多年不再上朝，国家运转几乎停摆，党争持续，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。而东北，崛起了努尔哈齐。大明朝可谓千疮百孔，却没有张居正这样的强人来力挽狂澜了。明神宗死后仅24年，明朝灭亡。

自古帝师难为。帝师从来只敢教皇帝如何当皇帝，却不敢教皇帝如何做人。因为“君权神授”，皇帝从来就被视为道德模范，何需人教？但恰恰悲剧的是，许多皇帝品德都有问题，品德有问题却君临天下，注定了封建王朝的悲剧。像朱翊钧，品德是大大大的有问题，他恨张居正“威权震主”，借清算他来显示自己才是真正掌握权力的人，对人不对事。他任性到凡是张居正赞同的，他都反对；凡是张居正反对的，他都赞同；张居正苦心推进的改革，全部废止……所以，这个有明一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，实质上自毁长城，几乎推倒了张居正的一切努力成果，令人扼腕长叹。

朱翊钧品德差，还在于他身为皇帝，拥有天下，居然还是个贪婪的财迷。比如，他强征矿税，是他在位期间的一大硬伤，使明朝逐渐走向衰亡。朱东润在《张居正大传》中写道：朱翊钧为什么要抄张居正的家，是听了诬告“金宝万计，尽入张府”，“这两句，注定张宅抄家的命运。明朝的法律，抄家只有三条：（一）谋反，（二）叛逆，及（三）奸党。居正的罪状属于哪一条呢？不管他，查抄底诏令下来了。许国说：‘无令后世议今日轻人而重货’；这才是一针见血之言。”

事后，朱翊钧很郁闷：抄了张家，并没有抄出多少财宝……

轻人而重货——张居正培养了这么一个皇帝学生，确实失败。但这能怪张居正吗？著名学者韦庆远著在《暮日耀光：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》一书中揭示：张居正要推行改革，不得不集中权力，但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而无所制约，势必引来皇权的反噬，酿成悲剧，张居正死后的凄惨正好诠释了此点。

五

历史最终为张居正正名。明神宗朱翊钧死后两年，朝廷给张居正恢复了名誉。《明史》盛赞他为政期间“海内殷阜，纪纲法度莫不修明。功在社稷，日久论定，人益追思。”梁启超更评价他为“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”。

张居正于历史有大贡献，但正如《暮日耀光：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》书中所言：他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，但他同时也存在“失误、失律和失德”。他的光芒，掩盖了“失误、失律和失德”，他不进于慎行真心实意的劝诫，也没有顾璘式苦心孤诣的点拨。遗憾的是，只有一个顾璘，只有一个于慎行。

自古至今，良师难得，高徒难得。

新华网



于慎行金榜题名 资料图片